

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变迁与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重建

戴 锐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权威意识和权威人格是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回溯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的结构及其教化功能的实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在社会教化的运行机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权威这一主体力量的缺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社区权威的作用,在党组织的非权力性影响下,形成有社区党组织领导和参与、由社区正式权威主体和非正式权威主体构成的多元权威格局,从而重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社区权威 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社区党组织 社区工作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0)02-0006-04

在考察当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时,我们发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也许会认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往往看不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正在发挥的作用,甚至根本没能意识到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就在于,由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的特殊主体力量——权威——在当前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致使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因缺乏有效的主体力量而处于缺位状态。为此,本文拟从对农村社会中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的变迁问题入手,思考当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以社区权威^①为中心的当代重建问题。

一、权威的作用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的“权威”

一般而言,“机制”的含义在于特定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和相互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因果联系而共存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各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运行和实现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大多

会从主体、目的、动力、环境、运行方式、运行程序、过程控制和保障力量等方面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问题,然而,这种描述固然全面,但由于其追求全面性而显得不得要领。我们必须在所有要素中找到一种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最具主导性、能动性的力量,机制才能获得运转的动力,才能保持良性运转的态势,才能实现其运转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谁主导着机制的运行,并在运行中发挥最突出的影响力,即便是这种特殊的主体力量。就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来说,最有效、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即教育者),就是机制的真正核心。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自然会问: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的教育者是谁?谁在所有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者中可能最具影响力、最可能获得预期的教育实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并没有一个法定或正式的思想教育者主体系统,那么,它依靠谁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现代社区的思想教育可否依靠他、如何依靠他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会指向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主体力量——社会权威。

关于权威的理论大多习惯于从影响力的基础、

收稿日期 2010-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BKS05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07ZZC012)

作者简介 戴锐(1968—),男,安徽寿县人,教授,博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研究。

① 尽管这里的社区不包括以网络为代表的虚拟社区,但由于每个人都可以从网络获得知识信息,实现情感沟通和社会支持,社区的功能在虚拟社区中同样能够得以体现和实现,网络交流的交互性、平等性也对社区权威的影响力形成致命的减损后果,不过,网络社区同样可能成为传统权威利用网络力量实现复活的契机。本文中为了便于叙述,未就网络社区的权威问题进行探讨。

来源、实现方式等视角解释权威的作用,比如是否拥有职权,是否具有个人魅力,影响力来自强力、理性、知识还是道德,是通过强制、支配、民主、奖励还是其他某种方式对他人施加影响,等等。本文则仅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这一主题下讨论权威,着力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何以需要权威、权威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问题。

在人们对权威的研究中,权威所起的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一直是被充分关注和重视的。恩格斯在考察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时发现,这些经济关系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替代的趋势,而这种“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联合活动又是靠权威才能组织起来的,这是因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1]”。实际上,不仅是在大机器生产的时代,权威自其产生起,就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协调社会各要素,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使社会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即使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政治国家消亡、政治权威消失时,社会生活管理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威仍然会继续存在并发挥着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问题上强调权威的作用,不仅由于权威的力量可以用来维护、发展社会秩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着权威色彩较浓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与“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思维路线有关,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家为单位的,家文化中对家长的尊重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与整体主义的社会哲学思维路线有关,整体主义所强调的“集中”概念的盛行,养成了依附性、服从性的民族文化。由此,“权威和权威崇拜的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事方式,进而造就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权威意识和权威人格^[2]”,这种权威意识和权威人格也成为传统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基础。现代中国社会所遭遇、经历的急剧变迁和转型,尽管使权威的影响空间、影响强度和影响时限受到了制约,但并未真正冲垮权威对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发挥作用的这种社会心理基础。既然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就应当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并将它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要素。

二、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及其教化功能的变迁:以乡村社会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是以乡村社会为典型的,乡村社会中的权威生成机制实际上反映着中国社会

中权威生成机制变迁的总体脉络和基本态势。

人们通常将传统的中国社会称之为“礼治社会”,这里的“礼”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3]50}”,那么,传统的教化在哪里进行、由谁实施呢?也许只有乡土权威才是最适宜担当这一角色并能胜任愉快的。乡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特殊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3]365}”,这种教化性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并不仅限于亲子关系,它会扩展到成人、扩展到族人,扩展到任何处于差序格局中的低位序的社区成员,甚至还会扩展到已经流动到外乡的族人乡亲。此外,这种教化性权力的运用也并不拘泥于特定的形式,正式的文化传播过程(比如家族会议上对后辈的训导)固然是这种教化性权力的运用情境,但一个民间纠纷的调解过程,往往同样成为一个长者在训诫犯错者、解决纷争的同时教化众人的良好机缘。

当然,以上所述的仅是在以长者为中心的权威结构形态下乡土权威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或曰教化)方面的总体情况。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乡土权威不仅在结构形态上,而且在控制和影响力的对象群体及其控制和影响能力、影响方式上,都呈现出一个演化或剧烈变迁的过程。

在隋唐以前,乡土权威的影响主要是在家族,尤其是世家大族内部得以实现和体现的。由于家族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内部关系不平等,因此依靠一般社会礼法制度约束子弟与部曲,并不需要另立对家族成员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族规,对于家庭成员以劝诫为主,强调精神的认同与思想的规范。这一时期的家训表现突出”;隋唐以后,随着世家大族的分崩离析,庶民家庭兴起,以道德伦理为劝诫内容的家训这时也开始向家法族规方向转变,以适应家族社会的新变化。当庶民家庭直接面对的是国家朝廷的时候,他们需要一套协调国家、地方、家族的规条。同时国家亦通过文人士大夫这一中介将国家意志贯彻到社会基层。^[4]换言之,庶民家庭兴起所导致的家族的分散化使世家大族的族长的权威逐步衰落,国家法律和行政力量开始日益进入乡村的日常生活,惩罚规则也在社会教化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权威开始出现多元化、行政化、强制化趋向。多元权威结构以及权威的行政化、强制化自宋代开始日益明显。此时的乡村社会权威主要包括代表专制政府对乡村民户进行管理

的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①和代表地方性的“私”的系统的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 and 房长，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士人、僧道等，以及民间组织的首脑。他们在乡村的社会控制和民众教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权威格局和社会教化机制可以说基本未发生变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土改”到10年“文革”结束，国家的政治权力通过对个人思想的改造和基层政权建设，得以全面渗透到乡村的政权建设和社会生活当中。与此同时，民间教育也让位于国家集中统一进行的规范化教育。政治与行政权威成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主要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因辈分尊长或德高望重而成为民间权威者在各种运动中遭受打击，其权威地位被彻底摧垮，他们既不愿、也无条件再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此时，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影响力的高度依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体现为以单位制为依托的行政化或权力化形态，具体地说，就是由上级统一安排教育活动，通过地市—县—社—队（在城市则为单位或居委会）的上传下达，实现层层部署、层层落实，以指导、督促、检查为保障措施，由此发动和实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农民离开家乡走向城市，农村的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旧有的政府主导的单一的权威结构面临着转型与重构。一方面，行政化的权威体制出现显性危机，原来村干部的角色在逐渐地转变成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在国家权力代理人将这种权力当作是一种资源而与特定的人进行差异性交易时，社会的不公正便会由此产生，从而使村民对国家的权威体系失去了必要的认同和信任。^{[5]149}另一方面，80年代以后，“私化的生产方式使理性计算成为村政府与村民交往的基本原则；村干部通过为村民‘做实事’而赢得在村里的权威地位；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思想监控上的开放态度，乡民在国家权威的场域之外，建构起新形式的民间权威的运作体系，这种非制度化的权威与村政府的权威和乡镇法庭的权威这类制度化的权威保持着相互竞争和对话的关系。”^{[5]255-256}此外，经济发展使一部分先富起来者通过其财富和获得财富的智慧、经验而获得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社会流动则使一部分见多识广者也获得了乡村权威的特殊地位。相应的权威结构也在新形势下呈现出“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单向型向多维型的转

变”^[6]。身处于这一复杂的多元权威结构中的各种权威主体，都会凭借自己的特长，向他人传导关于政治国家、社会生活和人生历程等方面的知识、观点和经验，由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在去行政化的同时，呈现出非权力化、无中心化的趋势，但同时也出现了动力缺失、机制失调等问题，因此，寻求新权威、重建新机制也成为农村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

三、党组织非权力性影响下的多元权威格局：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重建的关键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全面转型，我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以超越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多元权威格局，但城市的情况并非如此，反而出现了权威的消解。就社区而言，在旧有的高度行政化的权威格局瓦解的同时，却未能形成新的权威格局。由此，也使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丧失了有效的主体依托，从而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低效和影响力缺失。

城市社区权威格局未能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社会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法制发展与法治国家建设日益确立了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和依赖，制度权威——也即人们对制度的尊重和服从——在城市公众的心目中比自然人权威更为重要和有效；单位制的逐步退隐使单位干预公众生活和思想的能力日益减弱，即使不少人仍然生活在单位中，但单位主要地是以职业组织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发展，而难以切实地对人们职业精神之外的领域产生有效影响。其二，城市人口的居住结构变化。传统社会中，无论是高官、富豪、文人，在居所方面大多并不独立于普通人而形成孤立的居住区域，他们虽然会有深宅大院，但这大院可能会处于平民圈之内。他们会因其权力、财富、知识等而受人尊重，或直接获得名望、尊崇和影响力，从而成为当地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力量。随着官员、富人或其他特殊社会阶层成为社区结构的独立部分，其内部会因各自的影响力大体相当而无法产生公认的权威，同时又由于其疏离行为而无法成为大社区的权威。而在成员相对庞杂的居住区域，由于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不一、社会的信任度降低等原因导致社区成员间相互缺乏了解，同样无法确立公认的社区权威。其三，权威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受到的挑战。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权威的信任、依赖或崇拜，往往基于权威所握有的宗教权力、经济权力（如家族内或行政区域、单位内的

^① 由于州县官吏并不生活在乡村，尽管他们同样可能在特殊情势下对乡村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应视为乡村社会权威。

资源分配)、不对称的信息(如社会知识、生活智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敬畏心理,而社会的法治化、信息化等会使权威在上述方面的优势全面削弱,等等。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若以权威格局重构为中心重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必须在社区去行政化的前提下,找到一个新的主体力量,对社区中具有权威潜质的主体加以统合。在笔者看来,唯有社区党组织堪当此任,也只有在社区党组织的积极努力和核心作用之下,才能重建一个以非权力性影响为特征、以社区多元权威为主体力量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依照前文对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或曰教化)功能的描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社会权威的作用在当前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都不可或缺,而且为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还应当构建一个社区党组织领导和参与下的多元权威格局。这个多元权威结构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区的正式权威主体。笔者认为,当社区去行政化之后,行政人员应当退出社区权威体系,而改由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工作者群体担当正式权威主体。这要求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社会工作者具有高尚的品格、强烈的公众服务意识、良好的社会形象。为此,社区社会工作者的培养、教育体系亟待加强和完善,同时,在组织体制上,社区服务体系(如社会工作站、养老服务机构等)也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并强化他们在服务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和职能;二是社区的非正式权威主体。在这方面,主要由社区离退休人员充任此种职能的现行模式似可商榷。可考虑由党组织在人们所说的“体制外精英”中进行选择,他们的现身说法往往会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农村社区,还可考虑加强乡村宗族权威、经济权威、科技权威的影响力。

通过完善党的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增强党的非权力性影响力,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的重要保证。党的非权力性影响是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以来基层工作的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确立自身的非权力性权威,也即人民群众对党的自觉的心理认同、支持与拥护,也是党的一贯追求。“非权力性权威是依赖于人民对党的心理与意识的认同而内存的、相对持久的一种权威。权力性权威,只表明服从,并不意味着自觉的服从,即这种服从可能是被迫的。处于被迫服从状态中的人们总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非

自愿状态,因而也就有可能使现行的政治体制变得极其不稳定……非权力性权威是自觉的服从,而自觉的服从意味着政治体制处于一种协调、稳定、良性互动的状态。^[7]在革命时期,党的非权力性影响主要通过“反权威”式的社会现实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信念传播等途径实现的,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若要想使这种非权力性影响力维持并得以提升,笔者认为,必须通过完善党组织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职能来实现,否则,党组织既无法直接地对公众施加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有效影响,更无法领导和团结其他的社会权威共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4-225.
- [2] 肖太陶.权威·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权威意识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31.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4] 萧放.中国民俗史·明清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5.
- [5] 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 [6] 张文政.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与乡村发展[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1.
- [7] 姜卫平.党要提高非权力性权威[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1):35-38.

·简讯·

全国科学技术学暨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 2010年联合年会在河海大学召开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学(S & TS)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河海大学承办的“全国科学技术学暨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2010年联合年会——全球化时代的科学技术:使命、政策与范式转变”研讨会于4月9~11日在河海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所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26篇。

(本刊编辑部供稿)